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 吴志成　张峻溯

〔提　　要〕大国战略稳定事关国际秩序与人类前途命运。中美两国就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建设性战略稳定”倡导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在根本上既区别于美苏冷战期间的所谓“经典战略稳定”，也不同于国际关系史上的其他战略稳定关系，开创了新时代大国战略稳定理论新范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必须坚持合作互利共赢、积极良性竞争、有效管控分歧、建设持久和平。面向未来，中美两国要把握新定位、校准新航向，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在和平共处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分歧，在公平合理的框架内有效管控竞争，在互利共赢的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共同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关 键 词〕建设性战略稳定、百年变局、中美关系、战略认知

〔作者简介〕吴志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

张峻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6）5 期 0001-21

随着百年变局深刻演进，大国战略博弈加剧，国际体系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人类再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大国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和责任，也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手段，应该积极展现历史主动，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指出：“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1]中美两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和最大发达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影响国际体系的运行和世界秩序的稳定。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需要两国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2]

2026 年 5 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指引新的战略方向，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最重要的政治共识。2026 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进行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3]“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提出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普遍期待，驳斥了西方世界盛行的“新冷战”和“脱钩论”等错误论调。推动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仅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也为回答“百年变局下大国关系向何处去”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

[1]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62 页。

[2] 《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最重要政治共识——中美元首会晤是一次历史性会晤，达成丰富成果》，《人民日报》2026 年 5 月 16 日，第 1 版。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人民日报》2026 年 5 月 15 日，第 1 版。

一、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稳定及其概念演变

不确定性是国际社会的重要特征，对确定性和稳定性的追求指引着人类不断发现真理和改造世界。恩格斯指出：“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本质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本质条件。”[1] 平衡这一相对稳定状态始终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回顾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历史，复杂的国际政治现象通常被理论化抽象为“政治系统”。在体系—单元、结构—行为体等系统要素的互动中，国际政治系统的稳定性问题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稳定性是对系统在非平衡状态下保持自身有序性特征的客观描述，体现了非平衡向平衡过渡的趋势；[2] 国际关系中的稳定性通常指向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或实力的变动重组。莫顿·卡普兰认为，稳定既可以指系统本身，又可用于指系统的一种状态，一定平衡状态的稳定性在国际政治系统中颇为重要。[3] 由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作为根本假定，这导致国家意图、国际合作等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一定平衡状态的稳定性”被西方学者视为消除或缓解无政府状态负面影响的有效工具，也由此形成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和战略稳定研究的学术脉络。

（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稳定与战略稳定

长期以来，国际体系的稳定问题始终是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学术议题。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稳定主要包含两种类型，最常见的类型是“体系稳定”，即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被体系内的其他国家或国家联盟所淘汰时，就实现了体系稳定。国际体系的稳定问题在国际关系讨论中经久不衰，并与战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55 页。

[2] 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63 页。

[3] 莫顿·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薄智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2 页。

争与和平问题紧密相关。第二种类型是“资源稳定”，主要指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均无动机或手段改变当前国际资源分配格局。[1]

在现实主义理论范式下，“体系稳定”问题受到充分重视，国际关系中的体系稳定常常与权力平衡即均势联系在一起。汉斯·摩根索认为国际关系中的稳定是一种均衡状态，均势是维持国际和平与秩序的关键机制。[2] 摩根索对稳定问题及其实现路径的理解来源于西方国际关系史，尤其是对以“欧洲协调”为代表的欧洲均势体系的考察。美苏冷战开始后，国际体系中的两极格局得以确立。有学者认为，冷战两极格局本身就是一个相当稳固的国际体系。尽管冷战期间也存在相互竞争、令人焦虑和不可回避的危险，但大国关系经历了 20 世纪最长久的稳定时期。[3] 在冷战经验事实之上，肯尼思·华尔兹提出“均势自动生成论”，从结构视角论证了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秩序稳定实现的基本条件，并坚信两极均势比多极均势更加稳定。[4]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战略”一词源自军事领域，主要指事关全局性、高层次、长远性的重大问题，战略的本质偏向于稳定；[5]“稳定”则是对平衡状态的动态描述，尤其强调关系状态的低波动性和可预测性。有关战略稳定的定义，目前学界并无普遍共识。传统意义上的战略稳定主要用来判断军备控制方案的优劣，并考察双方战略力量对比对国际关系的影响。[6] 就其指涉对象而言，战略稳定讨论的主要是大国尤其是拥核国家，既可以指拥核国

---

［1］ Emerson M.S. Niou, Peter C. Ordeshook, and Gregory F. Rose, *The Balance of Power: St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61-64.

［2］ 参见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8, pp.125-133。

［3］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0, No.4, 1986, p.42；于滨：《关于大国竞争的博论》，《俄罗斯研究》2026 年第 1 期，第 39 页。

［4］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36 页。

［5］ 鹿音：《战略稳定：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时事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13-214 页。

［6］ 李彬：《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6-68 页。

家之间关系的协调，也可以指国际体系的稳定状态。从国家层面看，战略稳定主要描述拥核国家之间不存在武装冲突的关系状态；从体系层面看，战略稳定是指由大国构成的国际秩序处于协调状态。[1] 除此以外，战略稳定还被界定为一个地区或全球的安全环境得到充分保障、大国之间实现和平相处的状态。[2]

（二）冷战期间的美苏战略稳定

冷战期间，有关战略稳定的讨论大多集中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威慑与军备问题。美苏实现战略稳定的核心逻辑是确保双方即使在遭遇核打击后仍然能够进行有效反击，[3] 其实质是将军事力量的平衡视为战略稳定的核心要素。美国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于 1958 年提出“恐怖的脆弱平衡”，[4] 形成了以“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为核心的核威慑理念。在沃尔斯泰特看来，达成“恐怖平衡”的原因在于核武器的使用会给各方带来不可承受的损失，由核威慑引发的相互脆弱性问题成为维系战略稳定的纽带。20 世纪 60 年代，托马斯·谢林在相互脆弱性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美苏关系稳定的前提：只有美苏双方都无法通过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完全摧毁对方的报复能力时，才能实现真正的战略稳定。[5]

美苏冷战期间的战略稳定主要基于“相互确保毁灭原则”和“相互战略威慑原则”，核均势成为冷战期间支撑战略稳定讨论的关键议题。[6] 在核均

---

［1］ 参见 James M. Acton, “Reclaiming Strategic Stability,” in Elbridge A. Colby and Michael S. Gerson, eds., *Strategic Stability: Contending Interpretations*, Washington, D.C.: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and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13, pp.117-118。

［2］ 参见 Williams Healthy, “Strategic Stabi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Future of Arms Control,” *Survival*, Vol.60, No.2, 2018, pp.45-54。

［3］ Elbridge Colby, “Defining Strategic Stability: Reconciling Stability and Deterrence,” in Elbridge A. Colby and Michael S. Gerson, eds., *Strategic Stability: Contending Interpretations*, p.48.

［4］ Albert Wohlstetter, “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 *Foreign Affairs*, Vol.37, No.2, 1958, pp.211-234.

［5］ 托马斯·谢林：《军备及其影响》，毛瑞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04 页。

［6］ Lawrence Rubin and Adam N. Stulberg, *The End of Strategic Stability*,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2-3.

势下，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主要有三方面内涵：一是防止先发制人的稳定，即核大国均无法在首次打击中彻底消除对方报复能力，没有一方认为率先发动核攻击是有利可图的；二是危机稳定，即两国关系因矛盾或冲突陷入危机时刻，双方都没有意愿将核武器放入政策工具箱中；三是军备竞赛稳定，即只要各方的核武器发展能够明显强化相互脆弱性这一长期现实，就能有效避免军备竞赛中的恶性循环，进而达到抑制战争的目的。[1]

美苏建立在核均势基础之上的这种战略稳定通常被称为“经典战略稳定”。“经典战略稳定”以防止核威胁为首要目标，虽然维持了冷战时期整体上的“长和平”，但是存在许多固有弊端。一方面，美苏战略稳定是一种被动形成的消极战略稳定。对美苏而言，双方都存在一个势均力敌的核力量对手并对其国家安全形成重大威胁。为了防止激化矛盾、升级威胁，抑制冲突发生，双方不得不作出某种战略稳定关系安排。这种“经典战略稳定”的关键在于确保相互脆弱性。20 世纪 70 年代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和《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简称《反导条约》）都将实现战略稳定的重心放在限制进攻性核力量和防御系统的发展上，通过放大核武器的破坏性换取美苏军事博弈的稳定性，以此保障敌对双方共存的基础。[2]

另一方面，美苏战略稳定仅限于军事安全领域，并以欧洲为地理中心。这不仅未能削弱美苏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竞争态势，也没有有效控制欧洲以外的安全危机和军事冲突。美苏冷战的总体背景之下仍然出现各种局部热战，不断冲击着国际体系的稳定格局。根本上，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维持的战略稳定只是核威慑的稳定，美苏并没有就双边稳定关系进行过任何有效的政治讨论。以沃尔斯泰特和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玛拉为代表

[1] Thomas C. Schelling and Morton H. Halperin, *Strategy and Arms Control*,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1, pp.32-61.

[2] 门洪华：《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稳定：进程、评估与中国担当》，《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 年第 13 期，第 8 页。

的战略界和政界人士在讨论“美苏之间应该实现什么样的战略稳定、如何实现战略稳定”问题时，将美苏双边关系的政治问题转化为美国的核力量建设和技术发展的单边性问题，体现出典型的工具理性主义思维特点。[1] 美苏双方都希望通过自身军备技术的扩张实现有利于本国的竞赛优势，军备及核武库建设的层层加码，使世界笼罩在超级大国的核恐怖阴影中。

（三）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战略稳定

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赋予战略稳定更丰富的内涵。以核均势为基础的“经典战略稳定”逐步演变为以共同敌人或共同挑战、相互脆弱性、经济相互依赖以及战略稳定机制共同作为支撑要素的“复合战略稳定”。[2] 罗伯特·吉尔平发展完善了霸权稳定论，将战略稳定等同于全球政治经济关系的稳定，其衡量标准是体系霸主是否有能力或意愿提供全球政治经济领域的公共产品。从类型上看，霸权稳定论体现了“资源稳定”的理论进路，实现战略稳定的条件在于国际体系中霸主对全球政治经济资源的有效供给与分配。霸主依靠其权力所形成的政治领导、依据其经济实力所维持的开放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构成了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3]

不过，霸权主导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稳定之间并非充要条件。在罗伯特·基欧汉看来，霸权领导具有领域的差异性，议题领域不同，霸权存续对国际机制稳定关系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在国际货币和贸易领域，即便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由美国所建立的国际金融贸易机制依然展现出较强的韧性。[4]

---

［1］ 葛腾飞：《美国战略稳定观：基于冷战进程的诠释》，《当代美国评论》2018 年第 3 期，第 85 页。

［2］ Thomas Fingar and Fan Jishe, “Ties That Bind: 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6, No.4, 2013, pp.125-138；王政达：《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建构依据、基本框架与发展趋势》，《国际安全研究》2019 年第 5 期，第 85-86 页。

［3］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4-88 页。

［4］ Robert O. Keohane,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 1967-1977,” in Ole R. Holsti,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Alexander L. George, eds.,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York: Routledge, 1980, pp.137-156.

经济全球化同时带来了复合相互依赖加强，国家间多渠道联系显著增多，军事安全不再总是占据议程首位，能源、环境、经济等议题重要性上升。由于军事作用难以发挥，中小国家可以采取“联系战略”，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有效制衡大国影响力，削弱国际等级的区分；政府间的正式与非正式联系、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跨国交往以及跨国公司内部的联系都成为实现战略稳定的重要路径。[1]

总的来看，学界有关战略稳定的讨论起源于美苏冷战，最初主要指涉核武器和军备问题；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战略稳定的内涵日渐丰富。战略稳定从大国核问题转向更加广泛的维持国际力量均势的涵义，复合特征日益突出。特别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历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后，一些西方学者承认，战略稳定必须建立在多维力量基石之上，单纯依赖军事力量的战略稳定结构是脆弱的，也必然会崩塌。[2] 从确定性看，“经典战略稳定”仍然是冷战后美国评估大国关系的重要标尺；在美国一些决策者看来，“军备竞赛稳定”和“危机稳定”是战略稳定的核心内容，战略均势与权力平衡则是战略稳定的根本支撑。[3]

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

冷战结束以来，针对“如何实现国际战略稳定”问题，出现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理念思路。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单边主义思路，试图无限扩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的军事优势，以此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战略稳定；另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建设性思路，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

[1]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2-35 页。

[2]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83-284.

[3] 钟振明：《美俄战略稳定与欧洲安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4 期，第 38 页。

全观，在平等有序和相互尊重基础上促进国际协调合作与多极化进程。[1]

（一）实现战略稳定的两种思路

第一种实现战略稳定的思路集中体现在美国与俄罗斯的战略稳定关系中。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依赖于冷战时期美苏达成的协议。美苏战略稳定实现的前提是确保相互脆弱性，而相互脆弱性必须以可信的战略威慑为保障，战略威慑又需要具备武器军备的相对优势。这就决定了美俄战略稳定必然继承了美苏战略稳定的缺陷——如果缺乏必要的政治机制建设，就可能加深国家间的猜疑和恐惧，危机事件也可能成为冲突的导火线而非稳定关系的“压舱石”。所谓“危机稳定”和“军备竞赛稳定”往往都会提高大国博弈的烈度。事实证明，相互脆弱性只会激发更深层次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更容易陷入安全困境之中。

乌克兰危机后，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放任《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失效，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机制所剩无几。而美韩正在进行的核潜艇项目已明显超越半岛防御范畴，直接触及地区安全与核不扩散两大核心关切，势必引发周边国家的反对和连锁反应。[2] 美国学界和战略界对稳定性及其实现路径的探讨从来没有摆脱威慑理论的窠臼，蕴含着对绝对实力优势的迷信，故而无法进行客观且不偏袒任何特定理论的稳定性研究。近年来，美国高调启动“金穹”计划，试图构建不受任何约束的全球性、多层次、宽领域的导弹防御体系。这一计划提出大幅增加外空作战手段，研发部署具有进攻色彩的轨道拦截系统，企图通过在反导领域建立的非对称优势来打破既有战略平衡。[3] 美国武器装备尖端科技的突破改变了军备竞赛的规则，反而造成了新

---

[1] 潘振强：《关于重建全球战略稳定的理论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02 年第 4 期，第 5 页。

[2] 姜龙范、谷思睿、徐志坚：《同盟困境下韩国核潜艇构想的演进逻辑》，《东北亚学刊》2026 年第 4 期，第 62 页。

[3] 赵学林、黎子琛：《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失效——国际社会希望两国重返谈判桌达成新共识》，《解放军报》2026 年 2 月 7 日，第 4 版。

的不稳定。

中国是第二种实现战略稳定思路的代表。中国倡导主权国家平等相待、尊重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坚持开放共赢，始终是变革世界中的建设性力量。[1] 中国倡导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在政治领域，所有国家和国家集团都应恪守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在军事领域，所有国家应将军事能力维持在保证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实施任何有可能被视为威胁其他国家安全的军事建设及建立和扩大军事—政治同盟的行为，通过积极和建设性对话解决分歧，增进互信与合作；[2] 在大国关系层面，大国是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关键少数”，拥核国家对国际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负有特殊责任，应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通过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磋商解决关切，增进信任水平，避免危险误判。[3]

（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指出，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要判断历届政府及其行动，必须以它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和它们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为尺度。[4] 美苏两国的战略稳定本质上是危机爆发后的被动灭火机制，其核心功能是在双方已处于冲突边缘时防止误判升级。[5]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中美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完全不同于美苏两国在冷战期间“两种制度”“两个平行市场”

---

[1] 王毅：《坚定做变革世界中的建设性力量——在第 61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专场”上的主旨讲话》，外交部网站，2025 年 2 月 15 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zhd/202502/t20250215_11555652.shtml。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16 年 6 月 26 日，第 3 版。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5 年 5 月 9 日，第 3 版。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87 页。

[5] 王文、鲁东红：《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历史演进、核心内涵与未来走势》，《理论建设》2026 年第 3 期，第 6 页。

的对抗对立状态。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立足两国交往历史，着眼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发展大势，在根本上区别于建立在冷战之上的美苏战略稳定关系。推动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既要把握国际关系史上大国战略稳定关系演变的普遍特点，又要回应时代问题，打破西方威慑理论的桎梏，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坚持以积极稳定超越消极稳定。大国能否保持战略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国际社会的战争与和平。西方学者从无政府状态出发，对实现国家间和平与稳定大多持悲观和消极态度。这种消极稳定意识在美苏冷战中根深蒂固。纵观冷战历史，战略稳定仅出现在美国国内的战略讨论中，并未被苏联正式接受，在美苏外交谈判中具体表现为所谓的缓和政策，其实质是核竞赛僵局的阶段性暂停。消极稳定不解决冲突根源，只缓解或压制冲突烈度。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虽然美苏双方力避热战，但轮番进行战略施压，世界处于核战边缘。这就是消极稳定失灵的典型写照。消极稳定建立在恐惧之上，本质是相互战略威慑和相互确保毁灭的脆弱性威胁迫使双方重回谈判桌前。积极稳定则是寻求建立在共同发展之上的平等协商和政治对话，要求双方充分认识彼此利益差异和观点分歧，同时也能够在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主动创造合作机会。

坚持以良性稳定超越竞赛稳定。大国之间有竞争也有合作，但竞争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更不是“相互确保毁灭原则”之下的核军备竞赛。美苏战略稳定以“军备竞赛稳定”作为维系战略稳定的关键支柱，最后造成拖垮苏联、军工复合体主宰美国政治的“大国竞赛的悲剧”。中国坚持“全面运筹同各方关系，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1]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发展正在重塑大国竞争态势，极易引发安全化军事化风险。同时，新兴科技发展及其军事化应用将影响军控进程，也会对全球战略稳定带来不良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2025年版，第385页。

后果、改变战争形态和方式、衍生新危险和新风险、引发新的法律和政治外交难题。[1] 中国外交始终积极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发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表明中国希望以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模式，实现中美和平共处、管控风险、合作共进。[2]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共同体视域下“共存理性”超越西方冲突辩证法下的“对抗理性”，有助于破解国际社会的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思潮。

坚持以常态稳定超越危机稳定。“国家之间有分歧是正常的，应该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3] 意识形态分歧不是对话协商的阻碍，利益冲突矛盾也不是破坏稳定的根源。只要秉持尊重、公平、对等的精神相向而行，双方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冷战期间，虽然战略侦察、即时通讯等构筑起美苏两个核大国之间的维稳机制，但是这些战略沟通渠道只是为了防止“不受约束的最坏情况”发生。[4] 美苏两国始终以赢得冷战胜利为最高目标，虚张声势和意图测试在两国外交中无处不在，这导致美苏关系难以摆脱“制造危机—博弈竞争—被迫谈判”这一危机稳定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5] 国家间关系早已不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淘汰赛”，完全可以实现相互成就、互利共赢的“正循环”，关键是要在国际合作中重信守诺，展现出负责任态度；同时也要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霸道等错误行径，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国际形势和各自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构建中美建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19 年 6 月 6 日，第 3 版。

［2］ 国纪平：《锚定新定位，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写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人民日报》2026 年 9 月 22 日，第 1 版。

［3］ 习近平：《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1 页。

［4］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Arms Control, *Nuclear Arms Control: Background and Issu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5, p.4.

［5］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558 页。

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其目标是实现中美两国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而非你输我赢、零和博弈，通过加强合作、有效管控和共同塑造来实现中美关系的动态平衡。

坚持以持久稳定超越先发制人的稳定。冷战时期美苏确保“先发制人稳定”的措施是维持双方高水平的核军备，确保具有相互摧毁的能力。虽然美苏关系在战略层面保持着稳定的“恐怖平衡”，但是在非战略或常规层面的稳定性则差得多。美苏两大阵营常常因封锁政策、外交孤立等原因引发低水平冲突，甚至导致局部代理人战争，双边关系也常常因意外情况而出现危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将大国互动看作是发展变化的关系过程，而不是固化的敌友身份结果。“建设性”既体现了大国之间不冲突不对抗的政治承诺，更指向未来合作的积极愿景。以此观之，如果大国之间的互动过程得以维护，即便当时没有产生预期结果，以良性竞争和务实合作为目的的大国关系也不会发展到不可逆转的地步。[1] 因此，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首先要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自发展权利，维系国家间外交关系，其次才是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具体问题。如果一方越过外交红线、践踏谈判底线，导致国家间相互信任下降、政治关系恶化，那么一切外交努力都会付诸东流，实现战略稳定也无从谈起。

（三）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实践路径

一直以来，西方学者对战略稳定的理解深深根植于冷战经历之中，认为真正的战略稳定始于认识到彼此的相互脆弱性。中国从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提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大理念，实现了对冷战期间美苏“经典战略稳定”的超越，开创了大国交往新模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既要树立正确战略认知、彼此相向而行，也需要在实践中展现大国担当。

坚持互利合作共赢。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合作共赢是普遍适用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

[1] 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431-432 页。

而且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其他领域。”[1]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合作共赢也应该成为大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原则。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不断加剧，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有效性、权威性不足问题更加突出，国际社会期待大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2] 在国际安全、绿色转型、气候变化等事关人类未来发展的国际公域，中美两国合作完全能够实现共赢多赢，关键是摒弃偏见和猜忌，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路。

坚持积极良性竞争。大国竞争不是时代底色，脱钩断链、遏制打压、零和博弈等恶性竞争解决不了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反而会加剧发展鸿沟和治理赤字。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竞争与合作并存是当今大国关系的普遍特点。大国之间存在竞争是正常现象，但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将竞争视为大国关系的全部。“国家之间可以有竞争，但必须是积极和良性的，要守住道德底线和国际规范。”[3] 中美之间的竞争也应该是相互借鉴、你追我赶的和平竞赛，同样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必须反对单边主义和双重标准。

坚持有效管控分歧。“世界是多样的，没有分歧就没有世界。一个家庭里还经常有这样那样的分歧。有了分歧并不可怕，关键是不要把分歧当成采取对抗态度的理由。”[4] 二战胜利前夕，美苏两国曾站在国际主义角度，秉持合作态度，尝试构建大国协调一致的战后国际协调机制，然而，意识形态差异加剧了超级大国在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国家利益上的分歧，美苏战时同盟迅速瓦解、合作迅速终结，世界由此进入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对峙。冷战期间，美苏竭力维持的战略稳定依赖于以核威慑为基础的军事支柱和以裁军

[1]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32 页。

[2] 习近平：《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26 年 9 月 25 日，第 2 版。

[3] 习近平：《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

[4]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96 页。

谈判、直接联系热线为核心的沟通联系支柱。这两大支柱充分证明，战略稳定的建立伴随着双方乃至多方的竞争和斗争，而这些竞争和斗争又必须处于制度化的轨道之中，必须避免因分歧出现颠覆性的战略误判。

坚持建设持久和平。习近平主席指出:“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1]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教训表明，大国之间的对抗和战争将给世界带来不可承受之重，使一切维系战略稳定的努力付诸东流。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需要树立“积极和平”观念，不仅要将稳定视为没有战争的状态，更要通过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来消除战争和冲突的土壤，避免大国关系陷入信任危机与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当前，全球和平与安全赤字不断扩大，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期盼，也应该成为构建大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目标。持久和平的世界倡导以相互尊重推动和平共处，要求将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视为国与国交往的基本原则。[2]

三、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回顾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认识和运筹中美关系，始终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美两国确定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世纪之初，中美两国加强对话，扩大共识，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全面推进二十一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新时代以来，元首外交领航中美关系走向新的历史定位。中美两国在加强对话、增进互信、发展

[1]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7 页。

[2] 吴志成：《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体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 年第 4 期，第 29 页。

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随着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中美关系已经成长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源于中美关系曲折复杂的历史经历，创造性地回答了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的关键问题。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契合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也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和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1] 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要求双方坚守目标，共同行动，不断丰富中美关系新定位的战略内涵，共同开启中美关系的崭新篇章。

第一，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筑牢中美关系长远发展的政治基础。大国交往，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这是管总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指出：“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2] 中美两国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已经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3] 中美关系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双方长期利益交融、共同发展中产生的阶段性问题，需要在共谋合作、长远发展中予以解决。如果中美两国视彼此为朋友和合作伙伴，两国就可以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中美关系也会平稳运行；如果中美两国将对方定义为对手甚至威胁，用遏制打压、威慑制裁的手段处理中美关系，两国关系就会遭遇挫折甚至面临倒退的风险。

---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人民日报》2026 年 9 月 25 日，第 1 版。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人民日报》2024 年 4 月 3 日，第 1 版。

[3]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宴会》，《人民日报》2026 年 5 月 15 日，第 1 版。

中国乐见美国自信开放、繁荣发展，也期待美国理性看待中国发展。[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关键是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采取求同存异的方法，增进交流理解、主动深化互信、扩展多领域合作。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也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湾问题事关中美两国关系的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面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可能出现的困难和矛盾，只要双方能够确立正确战略认知、筑牢政治基础、树牢底线意识，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增进理解对话，在兼顾彼此重大关切的基础上保持多轨接触，中美关系就能披荆斩棘，重回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轨道。

第二，有效管控矛盾分歧，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中美之间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等都存在客观差异，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决定了两国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遇到新问题和新挑战。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建设性的框架为中美关系定向设限。中美两国应该将竞争和分歧置于谈判沟通、对话磋商的“护栏”之内，聚焦有效管控分歧、重点解决问题。当前，中美两国各自情况和中美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中国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没有变，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立场没有变，赓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愿望没有变。[2]中美管控竞争边界，畅通交流渠道，顺应历史大势和国际社会广泛期待，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3]

---

［1］《相向而行，共同开启中美关系新篇章》，《人民日报》2026 年 5 月 16 日，第 2 版。

［2］《王毅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代表团》，外交部网站，2024 年 12 月 3 日，https://www.fmprc.gov.cn/wjb_673085/zzjg_673183/xws_674681/xgxw_674683/202412/t20241218_11496808.shtml。

［3］高飞：《以建设性战略稳定构建新时代中美关系》，《人民日报》2026 年 5 月 27 日，第 2 版。

和平共处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美两个大国必须守住的底线。但是，守住和平共处底线不等于实现“冷和平”。中美两国利益的高度相关性和互补性，决定了中美谁也离不开谁。中美之间实现和平共处要着眼于持久和平，以积极方法建设和平稳定机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对美政策始终保持延续性和稳定性，中国也从来不寻求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不干涉美国内政，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剧烈变化决定了两国关系中的磕磕绊绊、颠簸起伏将是一种“常态”。[1] 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既要不回避双方之间的矛盾分歧，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又要在承认分歧的基础上保持沟通和对话，在能够创造共同利益的领域拓宽务实合作，夯实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的“压舱石”。

第三，秉持合作共赢原则，拓展多领域交流合作。中美同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等方面肩负着特殊责任，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时代潮流曾让中美两国跨过太平洋彼此走近，共同利益让中美合作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如今，经济全球化深入演进，中美经济深度融合，中美拥有比以往更加广阔的合作领域，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2] 平等互利的经贸关系也是中美关系的“推进器”。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对华错误发动贸易战、关税战、科技战，不仅扰乱国际经贸秩序，也没有解决美国国内面临的贸易逆差和产业空心化问题，反而加重国内通胀水平。中美关系发展证明：中美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零和好，稳定比折腾好。

持续推动各领域交往合作，是中美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始终推动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往，为中美关系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元

[1]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2001—2016）》，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470 页。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人民日报》2026 年 5 月 15 日，第 1 版。

首外交对两国关系具有战略引领作用。中美领导人通过常态化的元首沟通机制，明确彼此战略意图，防止经贸、科技领域的博弈升级为全面对抗。[1] 在中美关系陷入困顿时，两国元首通信通话、互访会晤为指引两国关系转圜向好发挥决定性作用。从外交经贸团队的建设性磋商到元首会晤，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到达成双边关系重要共识，各层级各领域的对话沟通有效推动着两国元首共识的贯彻落实。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中美民间交往和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致力于鼓励和扩大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通过青年交流倡议、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以及便利化政策，不断夯实中美友好的社会和民众基础，为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注入持久韧性。2026 年，中美将分别主办 APEC 和二十国集团峰会，多边合作平台将为中美打造合作新增长点，两国在人工智能、数字转型、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将展现出强大韧性与活力，为世界发展注入稳定性和新动能。

第四，明确尊重、公平、对等的重要性，为中美探索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提供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对等解决各自关切，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2] 中美两国元首达成“尊重、公平、对等”这一重要政治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了两国交流合作空间，为中美两国关系及世界和平稳定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是中美两国避免战略误判、积累战略互信的关键。“相互尊重是人与人打交道的基本礼数，也是中美两国相处的起

---

[1] 杨洁勉：《中俄美国际战略互动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俄罗斯研究》2026 年第 2 期，第 15 页。

[2] 《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 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人民日报》2026 年 9 月 27 日，第 1 版。

码准则。”[1] 中美两国历史文化不同、具体国情不同，双方都有自身的核心利益，也都有必须捍卫的原则底线。相互尊重对方的底线，不试图改变对方或压垮对方，就是一切良性互动的基础。中美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之间也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确保公平，为中美两国公平合理的竞争设边界、定规则、守规矩。当前，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取得积极进展，新设立农业工作组，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和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300 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落地见效。中美双方在农业、贸易、能源、国际执法等问题领域逐步形成了机制化的解决方案，彼此合理关切得到同等重视和协商解决。两国正在相互尊重、公平对等的基础上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努力实现互利合作，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四、结语

当今时代，世界局势变乱交织，大国是影响战争与和平的主要因素，世界必须找到一条新时期大国和平共进的新路。[2] 面对国际形势之变、力量格局之变、思想认知之变，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大国关系新范式。中美两国于世界变局中校准航向，在时代激流中超越分歧，作出了符合历史潮流的正确选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擘划出新时代构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宏伟蓝图。这一重要共识打破了“新冷战”论调和“修昔底德陷阱”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迷思，是中美两国共同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

[1] 习近平：《汇聚两国人民力量 推进中美友好事业——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6 页。

[2] 王毅：《在历史演进重大关头开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国际问题研究》2026 年第 1 期，第 7 页。

处之道的有益尝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提出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等重要内涵，实现了对大国战略稳定理论的超越与升华。

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中美两国从破冰到建交，从孤立到接触，始终在对抗与对话之间作出选择。中美两国拥有广泛合作领域和彼此交融的利益关系，无论是推动本国发展，还是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都需要两国携手共进。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 17 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 80 多亿人民的利益，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中美应该秉持尊重、公平、对等的原则精神，主动扛起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共同推动人类迈向光明未来。

【责任编辑：宁团辉】